

《中西法律传统》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2023年第2期(总第25期)

法律、道德与公正的三重困局：清末永氏案再反思

黎良基

摘要 | 清末永氏案本系永氏诉宝环诱拐略卖，但被动牵涉出诬告其夫桂城的罪责。案件历经封驳、钦差覆审、再驳，仍以被告诱拐罪坐实，作为原告的受害者却受判诬告罪的结果结案。受害者的自救反成了自害，除却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以及司法的悖论”外，案件审理、封驳、覆审、再驳中的审断理由，都反映了当时司法环境中不同侧面的法理与情理，亦映射出其时代的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在永氏案及案件处理中，法律、道德与公正呈现三重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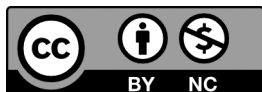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清末司法；诱拐；诬告；道德意识；公正

作者简介 | 黎良基，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专任教师。研究领域：法律史、社会经济史。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清末光绪年间，旗人桂城^[1]之妻桂永氏^[2]被同桂城素识往来的宝环^[3]数次拐卖，永氏逃脱险境后回家寻夫不见，遂向官府喊告寻求救济。刑部审案后，宝环诱拐罪坐实，永氏却受判诬告罪，均拟绞监后。此案历经洪良品封驳、光绪下旨派钦差覆审、洪良品再驳，含糊混依旧，可最终仍以原判结果定案。研究者指出，永氏艰难自救却陷于法狱的命运，体现了“中国传统法以及司法的悖论”^[4]。事实上，除却法律悖论外，永氏案审理中与审断后隐情争议始终不断，可从中窥探当时案件审断的法理与情理，而案中的法理与情理，更呈现出法律、道德与公正的三重困局。

一、合理怀疑与怀疑牵控：伦理政治与道德恩义的交锋

从案件情由分析，永氏受责的诬告罪是因其怀

疑丈夫桂城同诱拐有关，也正是因为这种怀疑，使她失去安全感并独自去官府报案述说被诱拐经历。怀疑，是永氏向官府报案寻求保护的关键动机，也是她将自己陷入诬告嫌疑的开始。永氏的怀疑，及其在案件告诉、审理过程中的表达，是否恰当，是否越过了合理界限构成诬告，本是诬告行为判定的关键问题，但刑部题本的表达模糊而显现争议。

[1] 亦称“桂成”，为同一人。

[2] 后文均简称永氏。

[3] 亦称“葆环”，为同一人。

[4] 闫晓君将清末光绪年间旗人桂永氏被诱拐一案系统呈现。参见闫晓君：《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切入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48-58页。

复盘案件的给事中洪良品对此给出了相应的封驳理由。

（一）名分与事实权衡：刑部对案情与伦理政治的取舍

永氏对其夫的怀疑，刑部题本有两段记录。其一为永氏丈夫桂城将永氏托付给熟人宝环，让宝环帮忙给永氏找工作，永氏被宝环拐卖“事后查知，心怀不甘，辄于喊告宝环时心疑伊夫知情，牵连妄诉”刑部判断该情节“实属有关名分”；另一为刑部发觉永氏的怀疑事出有因“且系控告宝环将伊夫牵涉在内，与有心诬告夫者有间”所以情有可原。^[1]这两段逻辑矛盾的记录是对同一事实的判断与描述，可刑部似无视了这合混与矛盾，于是，一则“牵连妄诉”成为诬告罪的定罪依据，另一则“情不无可原”成为减刑理由。

把两则存在明显矛盾的判断整合起来形成审断结果，刑部无疑在价值位阶中有取舍、排序，要害的关键处正体现在“实属有关名分”六字。清代法律在家内秩序中具很强的身份等级性，尊长对卑幼形成支配权，夫妻的名分不只是家庭角色的不同，而是法律地位上存在身份等级，“任何对尊长权威的侵犯，哪怕是无心冒犯，都会构成犯罪行为，从而遭到重罚。法律看重和强调的是秩序而非亲情”^[2]。在《大清律》的实际运行中，即使实告“妻妾告夫……（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有诬告更是“但诬告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3]，“不必全诬”一语实际是将非故意的诬告包含在内，即诬告故意并非诬告罪的定罪条件。当时法律环境中，没有故意的意外牵涉应被区别定罪，还只是一种新奇的观点^[4]，法律意向是明确的“定亲属诬告之通例以正名分也”，干犯名义的审理通常以两点为要，即“名者，名分之尊。义者，恩义之重”^[3]，若名分仍存、恩义未绝，则要严格按家族内部的尊卑来处理。

法律的政治核心为尊崇尊长权威（本案中即是夫权）使尊卑有别，具体案情就仅做次要考虑，是否有诬告故意并非诬告罪成立的关键。因此，清楚知悉永氏同“有心诬告者有间”的刑部，从优先判断冒犯名分的角度将永氏定为诬告罪，再通过具体案情分析其情有可原并减轻刑罚，完成定罪量刑。刑部的定罪量刑集中体现了伦理政治框架下的法律

任务，而事实攸关且情理不通的矛盾处则放置一旁。

（二）恩义、无心诬告与牵连妄诉：封驳意见复盘案情对永氏的道德辩护

依据案情，洪良品的封驳意见从同情永氏的角度得出不同判断，认为永氏的怀疑和引起的牵涉并不明确等于诬告。“罪名之出入必以告事诬否为断”，而案情中永氏仅是逃回后想找丈夫倾诉“遍寻不见，思其情节，疑与同谋，故不得已因控葆环而牵连及之”并非专门状告丈夫桂城，是陈诉对案情的理解，永氏供述时也特别说明“在提督衙门供说我男人也须知情的话，是我怀疑混说的，实不敢捏词妄告”，正基于此，洪良品封驳指出这个案件“似与凡妻平空诬告本夫者大有径庭”而显失公允，请求覆审。^[5]

封驳意见更注重案情，也更明确指出永氏并无诬告故意，说理部分同样是从名分角度入手，再从“恩义之重”的道德视角进行发散解读。洪良品认为法意中有伤名分的诬告一般出于四种原因：口角生嫌、妻妾争宠、暧昧别故和情甘离异，是夫妻间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并且存在过错“有憾于其夫，平空诬捏”，这样罚当其罪才是“罪有应得”，可永氏同上述情况截然不同。永氏是“唯遵其夫命觅主庸工”听从了丈夫的安排，在宝环欺骗永氏已经找到雇主后，永氏还有表达“回告夫知”的行为，道德判断是“犹知有妇道也”；迨被以义女名义卖给孙氏后，虽被诱逼卖奸，然永氏有“争吵不从”的抵抗行为，从节义上看是“居然贞妇也”；尔后拐卖方又以“另找雇主”的命运将永氏“转卖与文勋作妾”，永氏知晓后又有“跑出回家”的行为，

[1] 贵恒：《题为会审京城案犯桂永氏诬告伊夫桂城将伊契卖等情一案分别按照律例定拟请旨事》（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7-13340-017。

[2] 魏道明：《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3] 吉同钧：《大清律讲义》，闫晓君整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页。

[4] 同上注，第193页。

[5] 洪良品：《奏为天安门外朝房会审绞犯葆环诱拐永氏并永氏诬告夫桂城一案疑案甚多请飭复审事》（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315-056。

情感上体现“不忘其夫”。“有妇道”“是贞妇”“不忘其夫”是洪良品判断得出永氏宏观上不亏名分、不该受责诬告的重要道德理由。继而封驳意见指出,对比永氏,作为丈夫的桂城在名分和恩义上反大有问题,存在四方面疑点:其一,桂城与宝环熟识,将永氏完全托付给宝环寻找雇主,且在历久未归后未闻查询;其二,永氏逃回后多次寻找桂城未果,桂城直到步军衙门传讯后才出现;其三,桂城知晓永氏被拐卖后并未同妻子辨明情由,也未一同追究拐卖者,而只称自己对拐卖不知情,任由永氏受羁押,不合常理;其四,桂城虽患病,但妻子被拐卖应追责,自己有责任要辩白,不等对质却在中途自杀,不合常情。^[1]

封驳意见直面永氏诬告罪能否成立,直指桂城若无故卖妻是“恩义已绝”,应当有罪的是抛弃恩义而不是保守恩义的一方,进一步以“义绝”回应律文中最关键的、依据名分应特别判罚的“干犯名义”条^[2]。洪良品的封驳意见用“名分”与“恩义”做核心,辅以无恶意、无诬告故意的具体案情判断,至此封驳意见不同于完成伦理政治中法律任务的刑部,以道德立论兼及情理而直面案情,成功说服光绪皇帝委派钦差覆审。

二、是否贞烈与定罪判断:以道德为审查核心的复审

光绪皇帝因案件疑窦甚多,委派钦差翁同龢、怀塔布覆审,在后续的审断中,“名分”与“恩义”在法律与道德中均为核心,是案件争论焦点,而经审查后永氏节烈与否的道德疑点,成为案件最终在司法上定论的依据。

(一) 受害人贞烈与否成为审断关键

覆审官员翁同龢、怀塔布重新鞫问相关人后,虽未采信诱拐案犯宝环翻供的“和诱”辩白,但认定:永氏卖奸有人送往接回,虽只是拐卖方涉案人宝环、刘四、小林“供认不讳”,但“实系众证明确,断非虚诬”,另外永氏后被卖入文勋家后(原文写作“入文勋之门”),做了丫鬟打扮让人接看、命名,虽说被辗转价卖,但“历时已久”,于是“决非贞妇可想而知”,不用等她供认卖奸便可以判断“失节”。在覆审官员的判断中,“任人接看”“任人命名”“历时已久”这些永氏没有激烈反抗、没

有足够刚烈的表现,成为指认永氏“非贞”“失节”的充足依据。认定永氏“非贞”“失节”后,覆审官员判断“究出永氏甘心被卖情形”已经明析了合混的案情,解决了封驳指出的案件争议,认定永氏不是守节贞妇、案件疑点已经“不辨自明”。最终给出审断结果时,覆审官员再次强调永氏诬告其夫罪重、其余轻罪不议,维持原判,更进一步以永氏不守妇道作据为诱拐犯宝环辩护,认为宝环诱卖永氏是因为永氏多次到他家中,不同于凭空诱骗,故“其情尚有可原”。^[3]

统观覆审结果,覆审官员私下虽意识到“似告字必以词状为凭,若喊告无呈词,似有分别”^[4],对诬告行为本身存有疑虑,但事实上,永氏案覆审仍以涉嫌诬告其夫的名分问题为基础,放大审查诱拐受害者永氏的贞洁。贞洁审查被用来否定洪良品封驳意见中永氏本不负“恩义”的形象,甚至也被用来为不存争议的诱拐犯“说情”。以道德为着力点掀起的案件覆审最终并未改变司法困局。

(二) 逃脱时机与道德苛责

永氏自救摆脱诱拐厄运的反抗行为,是作为“名分”与“恩义”的重要辅证,也是不同审断意见交互的核心,并最终成为终审定案的重要依据。洪良品封驳原审结果,以永氏被诱逼卖奸“争吵不从”、转卖作妾不甘“跑出回家”作据,判断永氏为“犹知有妇道”的“贞妇”^[1]。翁同龢、怀塔布奉旨覆审后,上奏:永氏卖奸是诱拐团伙“众证明确”,永氏被诱以奴婢佣工名义转入文勋家(实转卖做妾)后表现出安于现状,认为永氏“决非贞妇可想而知”。诱拐受害者可能受迫于险恶处境的压力并未被覆审结果考虑在内,反而是通过永氏没有激烈果

[1] 洪良品:《奏为天安门外朝房会审绞犯葆环诱拐永氏并永氏诬告夫桂城一案疑窦甚多请飭复审事》,档案号:03-7315-056。

[2] 吉同钧:《大清律讲义》,闫晓君整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

[3] 翁同龢:《奏为本年朝审绞犯永氏被卖犯奸一案遵旨复审明确仍按刑部原拟定案事》(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315-072。

[4] 翁同龢:《翁同龢瓶庐丛稿(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180页。

决的反抗行为推断“不必待其供认卖奸而后谓之失节也”^[1]，案件覆审成为严苛的贞洁审查。覆审官员的审断意见最终被光绪皇帝接受，永氏被认定是“甘心被卖”，光绪以“此案葆环起意诬卖永氏，据供桂城永氏均不知情。惟永氏甘心被卖，辗转已久，业已众证明确，复怀疑牵控其夫，永氏、葆环均著仍照刑部所拟办理”^[2]宣布终审结果。于是，以道德同情结合案件情理发起的覆审最终通过严苛的道德审查收尾，当道德存有不完美迹象时，案情中的强弱对比和可能的被迫情形被忽视，公正仍在考量当中被缺席。也正因此，覆审重视的道德考察与刑部伦理政治下的法律任务达成了一致结果。

从逃脱诱拐、告官得实、被判诬告、封驳、覆审的整个曲折过程来看，永氏善于选择时机的反抗行为为她自己谋取了一线希望，但亦因为这种反抗不够激烈决绝最终失去了司法支持，甚至被司法权威剥夺了生命。这无疑表现出，涉及夫权问题、贞洁问题时，清代司法对女性有着严苛的要求，女性获取司法同情需要几近完美的受害者形象。而更重要的是，永氏案中，案情矛盾仅仅被当作伦理分析与道德审查的补充材料，其同公正息息相关的部分仅仅被偶然又模糊地在非正式场合提及。

三、桂城身死与定罪争议：案情迷雾下的公正缺位

永氏的命运以及永氏案案情始终同两名男性密切相连，其一是诱拐主犯宝环，另一是被“诬告”的永氏夫桂城，永氏案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公正都于永氏夫桂城紧密关联，而偏偏涉及公正部分时，桂城的情况被模糊和忽略性处理了。审断中，宝环的诱拐行为已经清晰明朗，但永氏夫桂城却笼罩着谜团。桂城与宝环本是密友，关系匪浅，常将永氏托付给宝环寻找佣工机会。诱拐发生后，历时已久却不见责问，永氏逃归寻夫也毫无踪迹。一直到官府传讯，桂城才出现，随即又突然身亡。永氏的丈夫桂城在案情中模糊而离奇，整个永氏案也随之波谲云诡。

（一）桂城对诱拐知情与否及被告定罪问题

从行为处罚的角度看，通常理解诬告罪的成立首先要有诬告行为，需要没有根据的诬陷告诉，正如洪良品封驳所言“罪名之出入必以告事诬否为断，

告事之诬否必两面对质，证诸所告之事，讯诸所告之人，昭晰无疑，方为情真罪当”，永氏告诉宝环诱拐案，是否是对其夫桂城的告诉？又确实诬否？这些纯粹的法律问题均不甚明晰。如前所述，《大清律》对“但诬告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规定得十分严格，司法在执行过程中出于维护尊卑秩序，打击得比较宽泛。告事不甚明晰，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不是争议焦点，无法得到认真审查，但所谓诬否，即桂城对永氏被诱拐是否知情，仍是诬告成立的关键，随着“桂城服毒自尽，讯因病重，自愿毕命”^[3]，这一关键始终在迷雾里争议不断，平添了许多隐情。

封驳意见批评刑部定罪证据过于薄弱“所据者桂城在步军衙门供称不知葆环拐卖伊妻一语耳”^[4]，而封驳所指出的四疑，不单是道德伦理上永氏夫桂城的名分和恩义存明显疑问，从案情公正角度看桂城是否知情也确为要害。

从关键性上，覆审官员同意“科永氏之罪，则应以诬卖永氏之时桂城是否知情为断”，但仍以简单推论和单薄的证据判定桂城对诱拐全不知情。理由一，推论宝环趋利避害不会自陷，宝环供认诱卖事情“桂城永氏均不知情”，这使得其罪责加重，即宝环不至于说谎害人害己；理由二，桂城供称不知情，步军统领衙门记录桂城生前供词称，有回家找寻永氏“未能找著之语。又有我并没教他在外佣工之语”。于是，仅基于宝环供词与桂城供词相互印证，桂城对拐卖不知情“已成铁案”，覆审官员本着“一人一面之词，概置弗论”的原则，认为永氏辩解部分的疑虑可以打消，可以定案。^[1]

洪良品认可“罪名之出入必以供招为凭”，但

[1] 翁同龢：《奏为本年朝审绞犯永氏被卖犯奸一案遵旨复审明确仍按刑部原拟定案事》，档案号：03-7315-072。

[2] 《清德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七光绪十八年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页。

[3] 贵恒：《题为会审京城案犯桂永氏诬告伊夫桂城将伊契卖等情一案分别按照律例定拟请旨事》，档案号：02-01-07-13340-017。

[4] 洪良品：《奏为天安门外朝房会审绞犯葆环诱拐永氏并永氏诬告夫桂城一案疑窦甚多请飭复审事》，档案号：03-7315-056。

对覆审结果和其依据难以信服,指出“案情前后歧异不符,罪名出入不协”。永氏找其夫桂城和桂城找永氏同样都是遍寻未见,可司法判断并不公平,知情与不知情的证据判断显失偏颇。同时,步军统领衙门案件处理怪异。认为桂城不知情却无罪收押;称桂城患病,不放回家养病,反而派多名官差以重囚的标准“役押至宛平县”,最终上报情形却为“服毒自尽”。洪良品分析“其中显有别情”,因此步军统领衙门在桂城身死一事上显存应解释的责任,其所记录的桂城供词证明力存疑,定案证据本薄弱而可疑。^[1]

以宝环不会自陷重罪推论其供词可信,在当时也颇受非议,宝环供桂城不知情按照清末判例“唯害人不害己”。洪良品再驳理由是依嘉庆刑部律例,“吓诱嫁卖”仅按律为军流之罪,宝环属于“按律,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妻妾者杖一百徒三年”,即使从重究办“罪止军流”,因此判绞本是量刑失入,宝环没有加刑罚的空间。然而洪良品再驳意见的分析并不可靠,首先是已有判罚先例,嘉庆年间本有类似案件“错拟军罪”被参,驳正后合依例“诱卖妇女,不分已卖未卖,被诱之人不知情,为首绞监候”^[2];其次,当时已明确“现例已改从严”律成虚设,“若被诱之人不知情,即拟绞候”^[3],刑部对宝环的判罚按当时现例是准确的。可即使如此,覆审官员判断宝环不会害人害己供述桂城不知情,因为这对他的量刑较不利,这一判断在律例上并无逻辑依据。现例需要做知情判断的是“被诱之人”即永氏,而非其夫桂城,若覆审意见认为桂城的知情可以为宝环减罪,则暗含逻辑是桂城因为永氏丈夫的名分,在卖出永氏一事中具有支配权、决定权,传统道德伦理最终在不受留意的身后给出致命一击。封驳中的道德伦理论述,本带来了永氏案的覆审,而从覆审意见的审断逻辑看,传统道德伦理对永氏的围困却更早,力度也丝毫不减狱中桎梏,洪良品意为永氏案寻求的公正也只能化为泡影。

（二）夫妻名分、贞洁问题与罪责关系：迷惑中的伦理与司法

审断意义上,永氏案最终以光绪皇帝上谕了结,被告宝环以诱拐略卖判绞监候,原告永氏以诬告其夫桂城亦被判绞监候。虽已尘埃落定。然而,关注

与参与审断过程的官员则记录下一些并未正式讨论的隐情。在这些隐情里,不论是永氏与桂城的夫妻关系,还是整个案件的罪责关系都显得越发模糊迷离。

永氏与桂城的夫妻关系,在案件发生时就存在问题,伦理道德上已入困境,其夫妻名分可能已经坍塌。研究者提出三点理由:其一,桂城生前口供称“曾向伊祖母说要永氏休弃”;其二,翁同龢日记中记载,案发后官府本令桂成领回永氏“而宝环、文奎、荣林等转向桂成索钱酬谢,桂成情急自尽”^[4];其三,同样是翁同龢记述,借住荣林、文奎家时,宝环曾与永氏“称是夫妻”^[5]。据以上三点理由,学者推测桂城已将永氏转卖给宝环。^[6]永氏自身既被桂城卖给宝环,事实上又被宝环转卖,妇女被作为财产流转的无奈已然充溢,而逃脱略卖报官之后的诬告绞刑,更是无所遁逃的压抑厄运。在“名分”社会的笼罩下,妇女贞烈死节尚可受旌表,而公平合理的权益保护却常受忽视。

永氏无法逃脱的还有贞洁审查与奸情指责。洪良品封驳对永氏“有妇道”“贞妇”的支持有力推动了案件覆审,但相应的,覆审也用了大部分精力来对永氏贞洁做放大审查。先是宝环翻供同永氏有奸,后又有流言称永氏虽不愿被卖故被辗转价卖多次,但同拐卖团伙有奸情,最终卖到文勋家时“文勋有表弟充文勋厨子,永氏又与奸好”,而永氏告状是受其唆使“意在挟制文勋”^[7]。猜疑与流言

[1] 洪良品:《奏为复审永氏葆环案情不符请派大员再行复审事》(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315-073。

[2] 全士潮等:《驳案汇编续编》,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03页。

[3] 吉同钧:《大清律讲义》,闫晓君整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4] 翁同龢:《翁同龢瓶庐丛稿(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5] 同上注,第175页。

[6] 闫晓君:《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切入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57页。

[7] 翁同龢:《翁同龢瓶庐丛稿(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下的奸情审查直接推动了覆审官员对永氏刑讯，虽然“讯诸永氏，坚不承认，事无佐证”^[1]，且案件记录也毫无对文勋表弟的调查，却仍使复查演变成人格审查，永氏也留下了“失节”与“甘心被卖”的印象，成为重要的定罪原因。按律例规定，诬告罪本无人格审查一项，司法实务角度中，“诱拐不知情案”的确“是否被奸污最为切要”，但切要相关的并非是被诱拐妇女的罪责，而是诱拐犯的定罪量刑，原因是“缘秋审实缓即以此判别也”^[2]。由此，永氏案的审断处理终是大启疑窦。

如若比较类似判例，永氏案事实上仍为量刑畸重。查道光年间“教唆奸妇诬告本夫抑勒卖奸”案。有李张氏先与郝宝庆通奸，后李张氏嫁给李骡子，为续旧好，听郝宝庆教唆捏词控告本夫李骡子引诱外人令其卖奸。因“惟该氏究系妇女无知，且一经到案，即行供明实情，其夫本李骡子并未受累，与始终诬执，致其夫到官受累者不同，情尚可原”，最终量减定拟为“除与郝宝庆通奸轻罪不议外，应于妻告夫诬者绞律上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并且可以“系犯奸之妇杖罪的决、流罪收赎，给与本夫领会，听其去留”^[3]。又查嘉庆年“控出有因原可酌量科断”案，贾六因“疑从前账目尚有未清”，诬告贾世雄本为其父养子且盗带其父本银一千二百两，审断结论是“所控不为无因。今到案既已据实供明，自可照申述不实律拟杖”^[4]。

案情对比之下，永氏主诉宝环诱拐，对其夫桂城只是疑及，而自身本被略卖已久产生怀疑更符合常理，无疑更“不为无因”更“情尚可原”，可却偏偏量刑尤重。由于永氏夫桂城死亡情形离奇，洪良品对审断结果耿耿于怀，后查询到步军统领衙门当差的德明供述，当时送桂城去宛平县时将其提出，桂城已是“呕吐不止”，将其“扶出角门”时桂城就已进入弥留之际“口内止能哼哼，随即身死”。洪良品判断，步军统领衙门上报情形明显同当差人供述不符，而上报言桂城“自称病重难以挽回，不如速死之言皆属捏造也”，对于这样同案件高度相关的情节，所留证据“前后迥然歧异，其中情弊显然”。^[5]这样的矛盾，在覆审时却未得到实质调查，同被着重渲染的贞洁审查形成明显对照。时人文廷式言及永氏案隐情时指出，案件含糊了解的原因，实际是永氏夫桂城被提督衙门凌虐而死“当时

刑部既不敢问及，故勉强定案”，案件后由翁同龢、怀塔布覆审，翁同龢刚在户部当值，派的办案人员均是户部司员，利害相关的提督衙门主官“大学士福锃，正管户部”，故对于涉及步军统领衙门的问题不敢过问，案件“大端既不能明，只得草草了结矣”^[6]。从洪良品与文廷式的分析看，永氏的命运实质更受到上层司法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强影响。

四、结语

永氏被略卖本是事实，作为受害者的永氏却因逃脱后寻求司法救济被责难，身体、精神、人格均饱受折磨，最终被剥夺生命，由于“古代诬告罪的审理往往是由审判官员对原告进行裁量”，永氏案中审判理由对桂城的信息始终模糊而含混，这直接导致了“传统法与司法的悖论”^[7]。事实上，永氏面临的本质是法律权利不平等情形下难逃的困局。从以尊卑为核心的名分法意，到几近要求完美受害者的严苛伦理审查，再到迷雾中的司法腐败、政治生态。整个案件及处理过程中，本应作为法律与道德基础的公正缺席，法律陷入了政治困局、道德陷入了情理困局，困局中的公正因素也成为最不具影响力的部分，呈现出法律、道德与公正的三重困局。在这三重困境中，永氏事实已失去对社会规则进行合理认同的空间，永氏案虽被称为“閨里之细事”^[6]，却映照传统法与传统司法生命力的消逝。

[1] 翁同龢：《奏为本年朝审绞犯永氏被卖犯奸一案遵旨复审明确仍按刑部原拟定案事》，档案号：03-7315-072。

[2] 吉同钧：《审判要略》，载《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3] 祝庆琪：《刑案汇览》，载《刑案汇览全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1页。

[4] 同上注，第2425-2426页。

[5] 洪良品：《奏为永氏夫桂城死因未明请飭复查事》（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315-074。

[6] 文廷式：《知过轩谭屑》，载《文廷式集》第三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53页。

[7] 闫晓君：《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切入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48-58页。